王船山读书西湖衡阳县学考

■周安林

在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之际，对先生读书何处？何校？以史志为凭作一考证，以免把史有定论清晰的问题弄成“是非”，有益正传学养，固化乡愁，增益地方人文底蕴、弘彰地誉。

船山先生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初一生于衡阳王衙坪，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享寿74岁，从出生到24岁武昌中举一直居家生活于斯。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初四张献忠陷衡州，为不任伪职逃避政治威逼，承舅父谭玉卿引匿隐居南岳。此后贫困流沛，终老于曲兰湘西草堂。

先生卒十四年后，他子王敔拜访湖南学使潘宗洛撰《船山传》，同治四年（1865年）江苏仪征人刘毓崧以帮曾国藩编船山遗书之便写《船山先生年谱》，余廷灿著《王船山先生传》。光绪十九年（1893年）先生八世从孙时任湖北巡抚王之春编撰《船山公年谱》，王之春把《国史儒林传》《子敔述》《船山公行述》、潘宗洛所写《传》、曾国藩撰《船山遗书序》、彭玉麟奏《改建（东洲）船山书院片》、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余廷灿所写《传》、唐鉴撰《学案》等闻人所著史料编入，结合志载，成为收集编辑船山先生行实文史最为详尽，一生行迹清晰，有些重要事迹精准到月日的传世佳作。为后世学人公认是最为权威可信的文史书记（雕版今藏市博物馆）。

王之春在序中言：“今公书已遍海内，而事迹散失，传闻异词，不有年谱，其何以原始察终也。”可知他面对“异词”旨在纠前讹，防后讹而编著《船山公年谱》：“传信后世，亦仁明不废也。爰揭颠末与世之读公书者质焉”。意为后世学人提供考证船山学行依据乃其初心，可知王之春对编撰此书为目的尽心承受的历史责任。

《船山公年谱》对先生何时入校读书，读书何处，记载十分清晰。明天启辛酉（1621年）先生3岁，因父王朝聘考入国子监副榜贡生进京履职，4岁时由大他13岁的哥哥王介之授学发蒙，在家受兄教授十年之久，其中只有八九岁和13岁时父从京归家小住而承父训授。

明崇祯五年（1632年）先生14岁时，与兄介之由湖广提学佥事王志坚主考，试列衡郡一等，考入西湖衡阳县学。16岁（1634年）时湖广提学水佳允岁试衡州，船山学绩列一等第一名；崇祯九年18岁，湖广提学佥事水佳允再次科试衡郡船山先生再次学考列入一等；崇祯十四年（1641年）先生23岁，湖广提学高世泰主试衡州，先生作文列一等；崇祯十五年（1642年）先生24岁，“湖广提学签事高世泰科试衡郡列公一等”七月与兄介之入武昌应乡试，由翰林院郭之祥、兵部给事中孙承泽任正副考官，九月出榜先生以春秋第一、中式第五名中举，兄介之以第四十名中为同榜举人。

这是他们兄弟继崇祯六年先生15岁，崇祯十二年21岁（兄介之中副榜）后的第三次参加乡试而终中举，第二年因李自成、张献忠造反“逢乱未赴会试”。与兄介之转道江西南昌由吉安涉云阳下洣水归乡。他在西湖衡阳县学连续读书10年，从14岁到24岁止，一生的上学读书经历。这是王之春编著《船山公年谱》清晰明白的记录，书成后百年世无异议。

近代有人以发现《衡山邝氏九修族谱》，王写《南卿公墓志铭》中有：“戊寅（1638年）夏，夫之等肄业岳麓”语为据，或说受教于吴道行，但年谱无记。《船山公年谱》只载他崇祯十二年（1639年）21岁上武昌参与乡试。归至城陵矶因“风厉樯析，幸得登陆，步至矶上走岳阳息岳侯祠”。“十月与郭公凤跂，管公嗣裘，文公之勇初集匡社”。也可能先生此行先路经长沙游学岳麓书院，与大他十五岁的衡山人邝鹏升（字南卿）短暂听学于斯，两人相识四年后邝去世，先生应邀作文扬誉初识邝公故留下“肄业”一说。实际上王船山非学出名校，其子王敔写《传》和从孙王之春编《船山公年谱》，书中诸公和吴道行等编著《岳麓书院志》也无记今人所重视的王在岳麓书院“读书”，可能他们从未看重此短暂之学而不记。《年谱》“初结匡社”一说，说明他此行确实结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有说是他父亲的学生）论学议事。查综合版（含吴道行修）《岳麓书院志》和《长沙府志》，记吴是明末生员，有吴道行听张元忭讲课岳麓书院的记录，无吴讲学岳麓书院与船山先生有师生之谊的记录。《船山公年谱》二十三岁（1641年）记“湖广提学佥事高世泰岁试衡郡列公一等，文评有云忠肝义胆情见乎辞。”24岁年初高世泰科试衡郡列公一等，也证明夫之他一直是衡阳县学的在藉学生，王船山一生学业得益于西湖衡阳县学教泽的历史事实。我们没有必要放大《年谱》无记历史不确的一小点，隐去史实清晰最有意义的历史长线为外地扬誉。又所谓先生读书石鼓书院说，查《石鼓书院志》未有他读书该院的记录，比他早六百年的周敦颐则记入石鼓书院17位“寓贤”，列在唐韩愈之后的第二位。

如从人文地理历史学问渊源的角度来研究王船山，邓显鹤在《船山著述目录》文中说他“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把宋明理学推向新的高度。王船山在西湖衡阳县学读书十年之久，是与宋五子之首理学鼻祖周敦颐幼孤依舅郑向园林的同一学思之地，608年（1024—1632年）间在同一学思之地出两位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乃是国中史无二例的殊荣，是增誉地方的佳话。王船山为原西湖衡阳县学濂溪祠撰书两副有名的传世对联，内神堂联曰：“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祠外柱联曰：“自尧舜禹汤文周孔之传，汉董唐韩，总未窥先生项背；读诗书易礼乐春秋之旨，张铭邵数，无非参太极根源。”先生以其精深体悟为其读书十年之久的母校写此绝世佳句，对周子理学精准地定性定位，为后世学子尊崇。从而可知他读书究理悟道之深，他学出西湖衡阳县学学功之扎实。他在此地读书受教十年之久，是西湖衡阳县学奠定了他“十五岁志于学”。成为“理穷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丧兴亡之故”。志在振兴国家民族的一代大儒，先生之功业垂誉润泽后世，衡阳县学此后所出的知名士子，如杨健、伍让、周家景、刘祖焕、常大淳、彭玉麟、曾熙等个个都有君子品和匡世之才，其群体效应成就了西湖这块爱莲君子地，理学始兴，延续不衰的荣光，衡阳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地，增誉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

薛宝钗形象蕴含着中国民众的道德规范和中国历史的解读密码。可以说，薛宝钗的生存策略就是一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从事政治斗争的形象指南。近日，长沙理工大学副教授华德柱做客国学讲座，剖析薛宝钗这一高情商女子的处事之道——

薛宝钗到底有多会做人？

■文/本报记者 许 珂 图/本报记者 黄 沐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要不然不会才进贾府不长时间，便使“阖家上下，无不称赞”。风头盖过林黛玉。那薛宝钗有什么方法，让自己在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贾府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没有特别的原因，她的绝招就是“对待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或者说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她对待以贾母为代表的贾府上层的态度，是讨好逢迎；对待史湘云、贾惜春等人的态度，更多的是体贴入微的关怀，给予帮助；对贾环母子是迎合不冷落，对手下的小丫头子严格要求；对林黛玉最有意思，是去其傲气降服。

华德柱

A 家境的变化让她“老道”起来

其实，一个人的处世态度，不仅和天性有关，还和自身遭际有关。

薛宝钗出生在本是书香继世的家庭，父亲在世时，令其从小读书识字，接受封建文化道德的教育熏陶。薛家又是皇商，十分有钱，但薛宝钗幼年丧父后，哥哥薛蟠在母亲的溺爱纵容下，又呆又霸，经营上一窍不通，后来又犯了死罪，打官司花去了大量银子，遂使家道衰落。

薛宝钗这种生活处境，使她“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指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于是使得她接触世面多，取得了最初的生活经验。加上从小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熏陶，封建思想意识已经渗入到她的灵魂深处，使她处处遵循着封建主义的做人标准，以致失去了少女通常的天真和单纯，表现出一种成年人的稳重和世故。于是，她年龄不大，却比较“老道”了。

期间，薛宝钗因入京待选“才人赞善”而寄居在姨母王夫人所在的贾家。这贾家是皇亲国戚、开国元勋的后代，不过到了这时，尽管外表显赫，内里已经十分腐烂。这个家族内部矛盾重重，无论是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姑嫂妯娌、夫妻嫡庶以及宗族亲戚之间，都处在复杂交错的利害关系之中，彼此机心四伏、互相谋算，到处勾心斗角，充满着猜忌和倾轧，甚至把一部分奴婢也拖进互相倾轧的旋涡。

显然，贾家的前途，对薛宝钗自然是休戚相关。她必须协助配合封建家长，去挽救贾家“运终数尽”的颓局。但薛宝钗毕竟只是亲戚，寄居在关系这样复杂的大家族环境里，她必须做到四面周全、八面玲珑、委曲求全、随机应变，精心处理好上下左右、老幼尊卑各方面的关系。

而从她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她安分随时、冷静达观、“小惠全大体”的处世心态。

B “会做人”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

薛宝钗初到贾家，为了使自己站住脚，必须先得取悦于贾家各位家长。贾母是整个家族的大家长，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使这个“老祖宗”成为这个家族里最受尊敬、最有势力的人物。谁要是得到她的喜爱和宠信，自然也就成为有地位的人了。

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宝钗过生日，就专点贾母爱吃之物和爱听之戏，引得贾母更加喜欢她了。这个细节素来被人们认为是逢迎拍马、媚上讨好，而当我们细细品味文中的两个细节，就不难看出宝钗的机敏恭孝、用心良苦。

其中一个细节：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她稳重和平，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日，便自己捐资二十两，唤了凤组来，交与她备酒席……贾母的上房摆了几席家宴，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其余皆是自己人。贾母是主人，且自拿钱与宝钗作生日，本就识礼守分的宝钗自然是“客随主便”，怎好一味依着自己的性子来，“喧宾夺主”呢？倘若执意推让，反而矫情生分得会让贾母不悦，不如依着老太太的口味嗜好点上几样菜几出戏，落得大家共同开心。贾母是长辈，宝钗是晚辈，正所谓“孝顺孝顺，三分孝七分顺”，晚辈在与长者的交往中，尽可能的满足其喜好，这便是孝顺。

宝钗的乖巧、柔和、孝顺、善解人意是众所周知的。而她在贾母面前，总是表现得温厚贤淑、端庄稳重、罕言寡语、安分随时，使得贾母多次夸奖她说：“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儿算起，都不如宝丫头”；“我看宝丫头性格儿温厚和平，虽然年轻，比大人还强几倍……心胸儿、脾气儿真是百里挑一的。”

对于其他长辈，宝钗也是很顾及她们的心理。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王夫人逼死了金钏儿，薛宝钗却察言观色开导王夫人。她在金钏儿死后对王夫人所说的一段话，常常被人误解为是冷酷无情的内心表现，但其实却是一种非常实在的体贴：王夫人当时对金钏儿坠井感到十分自责，这时宝钗再表现出对金钏儿的同情和怜悯显然不合适，所以她的第一反应是置疑“自杀”这一说法，以一句“怎知不是在井边傻玩失足掉下去的？”打开了王夫人的心结，然后对于金钏儿不珍惜生命的做法做出评价“不过是个糊涂人”来进一步减缓王夫人内心的内疚感。

王夫人在贾府也算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精明的薛宝钗当然会牢记在心。领导并非“万能”，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主动请缨为领导排忧解难，灵活自如，领导自然对你刮目相看，赏识有加。

从以上两个细节可以看出，宝钗既保持自己的清高、洁身自好，宽厚豁达，又深谙世道人心。“会做人”的确也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这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宝钗安分随时，察言观色，“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耳不闻，装作看不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

C “中庸之道”是她左右逢源的法宝

大家都知道，赵姨娘是个不好相处且地位较低的人。然而，赵姨娘对宝钗也是称赞有加：“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她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她都想到了。”

《红楼梦》中的赵姨娘是个小角色，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好比与自己并没有太大利益冲突的那种人。对于一般人而言，赵姨娘这种角色是可理可不理的，但宝钗她却不这么认为，并没有这样消极对待，而是积极地应付，力争在不得罪她的前提下争取她的“支持”，可见薛宝钗的“中庸”处世之道是成功的，这种为人处世的魄力不可说不大。

再比如，她对自己的“情敌”林黛玉，很少使用正面攻战。她对于黛玉随时随地投过来的“枪箭”，总是忍让，而少还击。然而，这位“战略家”除了能从侧面围陷敌人以外，还懂得攻心的办法。

薛宝钗知道黛玉是一个口齿尖利而胸无城府的人，于是冷静地窥视着她的弱点。果然有一次，黛玉当众引用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句，被她抓住了机会。她将林黛玉叫到自己屋里去笑道：“你还不给我跪下？我要审问你呢！”黛玉笑道：“你瞧，宝丫头疯了！审我什么？”宝钗故意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屋门的女孩子！满嘴里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罢。”黛玉不觉红了脸，便上来接着宝钗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宝钗笑道：“我也不知道……所以请教你。”于是，宝钗说了一整套的做闺秀的大道理，把黛玉教训得“垂头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

紧接着，这种折服工作之后，便是送人参燕窝给黛玉吃，以及种种对黛玉的温慰。于是，被她先立威后施恩所降服下来的黛玉便叫她做“姐姐”，叫薛姨妈做“妈妈”；还对宝玉表示，以前不该错怪了宝钗是“藏奸”；对宝钗从此不再设防了。

想想，就连敌人都支持自己，这需要怎样的一种人格魅力才能做到？这种力量简直就是无坚不摧。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如果能做到这种高深境界，那可就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了。可见薛宝钗的“中庸”为人处世思想是非常成熟的，她的“中庸”为人处世技巧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见她是很会做人，在人际交往中很是有一手，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中庸思想。

此外，“宝钗扑蝶”是《红楼梦》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细节，这个细节也能充分说明薛宝钗的“中庸”为人处世策略。四月二十六日，大家在大观园里游玩，但林黛玉却恰好不在其中，薛宝钗自告奋勇“他们都在那里呢，你们找他们去罢。我叫林姑娘去就来。”途中遇到“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扑。”在跟扑无果的情况下，却“只听滴翠亭里边喊喊喳喳有人说话。”因此，薛宝钗听到了小红和坠儿的全部谈话，内容大体是贾芸如何捡到小红的手帕子，坠儿如何要求小红给她和贾芸谢礼。这个事情在今天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因事关男女有别，却是十分敏感和严重的。为防隔墙有耳，小红突然决定推开槅子，导致宝钗躲避不及。

在这紧要关头，薛宝钗的“中庸”处世策略就起作用了：她一面故意放重脚步，一面故意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故意往前赶”，一面故意反问小红二人：“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一面故意说林黛玉“别是藏在里头了”，接着又“故意进去寻了一寻”。这么多的“故意”，显然是有意而为之，以致于“谁知红玉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如此高超的“金蝉脱壳”之计，以致小红无法不“信以为真”。当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坠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二人真的开始担心“嘴里又爱克薄人，心里又细”的林黛玉倘或走露了风声的后果。

一个小小的手腕，就把窃听他人谈话的嫌疑转移到了林黛玉的身上。虽然，薛宝钗所用的手段有点不正确，但站在她自己的角度，对她自己的利益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决策，这也充分说明了她的“中庸”之策。